

《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李歐梵著。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〇一九年。頁四四〇。

呂文翠，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討論《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此書主要收入李歐梵院士近期論文、演講十四篇，下文簡稱《晚清到五四》），其意義不限於一時一書，它映射著在英語和母語環境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文化融合的結構特徵，涉及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演化如何在當下學術語境中進行跨文化／語言／文類研究的理論思維與人文價值取向，顯示其立足當代生活與傳統對話的獨特方式。該書寓意深廣，於洞見處給後學啓悟，不見處是來者可爲之空間。

## 一、華夷<sup>44</sup>之間的「李歐梵現象」

李歐梵院士身爲華人，在美國大學名校東亞系研究教學中國現代文學，不斷地往返於漢語和西語世界作一種「中西文學的徊想」<sup>45</sup>，立意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導入世界文學視野，這些意圖鮮明體現於研究對象，在傳統與現代、世界多語種、多文類之間移步換形、轉身立定，心中幾十年不變的人文關懷愈加深厚，終於協商歸結爲「世界主義」。李歐梵出生在中國河南，長成於臺灣新竹，負笈美國學成而後任教於諸多名校，在哈佛大學東亞系榮休後轉回香港中文大學執教，他的英語和漢語寫作輪轉呈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某些領域因他而彰著，他研究的作家作品、文化文學現象關涉的歧異空間包含了中國、香港、臺灣不同時段的政經背景，他要讓原本是西方世界學術研究中的小眾對象贏得世界意義，於是不斷地開闢出多個領域並統攝於世界主義的人文目標，這個目標未始於政治卻有超越性的政治與道德功能，這個研究主體與對象之間的容涵複雜、關係特殊，在當代世界的人文研究中是現象級呈示，筆者稱之爲「李歐梵現象」。

李歐梵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學界的一個標誌，這在國際漢學界應無爭議。中國現代文學這個教學研究對象，在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大學裏是中文系的主要學科，是與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現代中國革命、國家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塑造不可分

<sup>44</sup> 借用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年）一書題名。

<sup>45</sup> 李歐梵：《中西文學的徊想》（臺北：遠景出版社，1987年）。

割的語言藝術形式，在西方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則主要圍繞著漢語言文學呈顯的現代中國社會人文的認知與評價。中國境內外的現代文學研究面對的對象與問題，在李歐梵開始研究魯迅的八十年代，已開始了不同程度的互動，但提出問題、採用方法與結論歸趨卻有顯著差異。李歐梵等來自中文語境而棲身西方大學東亞系的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以研究主體而論，其中國文化根性決定了在意識與潛意識中存在一股人文精神動力，使其不得不關注中國人文傳統的現代轉型與在當代世界中的位置。他們在華夷之間展開研究，處於外語學術語境裏，必須將中國發生的文學案例與世界文化、文學進行比較。在這個比較研究的過程與語境中，面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慣性與局面，不可迴避地意識到自己站在世界文學乃至文化的邊緣上，所以必須在這個語境和過程中尋找有效的工具來凸顯自己的研究。用外語進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表述不能不採用多國語言資源中的理論，不僅是柏拉圖 (Plato, 427-347 B.C.)、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的希臘古典理論脈絡與希伯來宗教源頭，更需要把握前衛的新創理論。所以，李歐梵院士等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採用理論的新穎與有效，常常會在外國同行之上。他們背負著中西（華夷）兩大傳統，西方傳統中的文化又因語言和民族而多歧，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層出不窮，研究範疇與邊界的擴張與收縮，將世界文學、文化內化，與母語的人文認同融匯，這就產生了在外語的東亞研究語境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能動與限制，這也是李歐梵現象的內涵與部分標識。

李歐梵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歷程中，每一次學術重心的敬側、跨向新的領域途程間的每一次驛動都對學界發生過或正產生著影響：他的五四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魯迅發自鐵屋中的吶喊、中國文化文學的現代性的追求、東方都市的上海摩登、晚清文學翻譯中的現代知識及跨文化、跨語言研究，都曾經、仍然或正成為學術的風向。李歐梵是有創作才具與經驗的研究者，具有一顆和學術對象喁喁對談的文心，所以特別值得緊密關注其深入研究領域的文心驛動。這次蘇州大學季進教授代編《晚清到五四》，給學界帶來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得以由剖析一個卓越研究者的文心驛動而洞悉這個學術領域裏的深刻的變與不變。這個論文輯本有著者新的研究成績，也有不太久遠的舊作，而舊作與現今正執行的研究計畫內在的邏輯一致顯而易見，其晚清翻譯研究中的林紓研究綿延四十多年前博士論文<sup>46</sup>的脈絡，郁達夫 (1896-1945) 的舊體詩與林紓 (1852-1924) 古文翻譯都是回溯

<sup>46</sup> 後改寫為《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1973)。

古文傳統，探究其時文化與文學的舊本新枝。無論新舊，李歐梵追究的是中國傳統人文的新生，是它與西方人文交接時的「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sup>47</sup>，是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學。

## 二、經驗與學術史

李歐梵治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經驗與其師長輩有別。固然他的魯迅研究立意受臺大外文系老師夏濟安(1916-1965)啓發，理論方法則未必追隨。李歐梵的五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經驗中開掘了多個新領域，《鐵屋中的吶喊》<sup>48</sup>特立獨行，《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sup>49</sup>盤空而出，「林紓的翻譯」較錢鍾書(1910-1998)另闢蹊徑，他研究對象的轉移是學術領域的開拓，有些領域獨自深耕細作，有些領域的進入是但開風氣，有些則和年輕學人共同推進。李歐梵的著述不乏與多個問題相連的歷史脈絡，卻未見他起意專作一部文學史，這是他與夏志清(T. C. Hsia, 1921-2013)顯而易見的區別。從他的學術語境可以略窺其因由：一方面因為他的時代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比較地多了一點，有更多的問題與討論；而夏志清無所依賴也一無束縛，能一氣寫一本《中國現代小說史》<sup>50</sup>，且比中國小說原生土地上的人們對作家作品有更多的發掘，部分原因是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並肩的同仁（除了兄長夏濟安）無人討論，要讓英語世界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必須有一個厚實全面的展示，表示這是一個西方世界中人還未具備能力正面審視與進入的宏闊領域，所以他會將小說家一個個排列出來鑒賞評斷，待到著作出版才有了來自東歐的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的商榷。當時夏志清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英語世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缺乏瞭解，李歐梵面臨解決的首要問題是中國現代文學有哪些是與西方文學具有對等

<sup>47</sup> 語出佚名：〈孔雀東南飛〉（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見逄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頁286）。

<sup>48</sup> 英文原版為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中文本為尹慧珉所譯，由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

<sup>49</sup> 英文版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於1999年由美國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中文版為毛尖譯，二〇〇〇年於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sup>50</sup> 英文原版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於一九六一年由美國 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中文版編譯者為劉紹銘，於一九七九年由臺北傳記文學社出版。

的現代藝術與精神內涵。

臺灣大學外文系的出身，李歐梵受老師夏濟安影響，有稍長的同學輩白先勇等人編刊物《現代文學》，他還為刊物翻譯過德國現代小說大家湯瑪斯·曼 (Paul Thomas Mann, 1875-1955) 的作品，所以李歐梵的「世界文學」絕非從一個空泛的概念出發，他衡量中國現代小說的尺度一部分是取之於歐洲現代主義文學。即使進入到《上海摩登》文化研究的階段，他將注意力集中於都市上海的商場與街道的文化之餘，並未放棄施蛰存 (1905-2003) 小說的現代主義內涵，這和一般的文化批評從都市建築等著手異趣。季進教授將〈「怪誕」與「著魅」——重探施蛰存的小說世界〉一文編入此書，讓這個脈絡的延伸得到更多讀者矚目。李歐梵在施蛰存小說文本之外著眼，找到與他的世界主義理念款曲相通的事實：生活居住在上海愚園路的施蛰存購買外文書的個人經驗是一種特別的世界文化流通，它以事實印證、闡述了李歐梵的人文目標，注釋「世界文學」概念的內涵，此處論述書籍的流通，與《上海摩登》裏探討上海的雜誌脈絡一貫。更有意思的是，李歐梵借施蛰存小說重新調整了他對上海文化研究與中國現代小說自身的文學性的均衡，以文本細讀彌補一般文化研究方法運用於文學的相對空疏，他最著意處是跨文化轉譯之後的外來翻譯文本「變成另外的文化或文學的一部分」（頁 366）。

《晚清到五四》中所收論文，李歐梵多有對施蛰存、郁達夫、魯迅、林紓再度的迴旋進入、賦予新義，並勇於對過去在這個領域裏的研究進行自我批評，這是他個人學術史的一種展現方式，也部分地定義了中國境外的現代文學學術史。綜觀其個人學術史，與其從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而《鐵屋中的吶喊》的順時序羅列，不如提挈其研究的脈絡性。林紓領起的晚清翻譯研究的跨文化脈絡，郁達夫〈沉淪〉引來的浪漫主義脈絡，在施蛰存則稱為「新浪漫主義」，這些對象同時存在一個與傳統關係的脈絡，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帶著這些脈絡進入現代與後現代文化。

所幸，季進教授的編輯方便筆者尋找這些脈絡，它是層遞進展的，卻往往以對過去的省思作為標誌。我們在《晚清到五四》中不止一次地發現李歐梵對過去研究的反省，每每對過去成果有「淺薄」、「膚淺」的評判，最重要的不是自我檢討，而是修正其研究方法與理念。他這樣表達在施蛰存研究過程中的反省與啓悟：「我們在美國研究一個作品的時候，作家的生平完全不管，而是用一種理論分析文本。可是我覺得在中國的語境裏，作家的背景與身世不能不顧，特別是

像施先生這種情況。」（頁 363）這種背景往往和他要尋找的「歷史的關節點」密切膠合。施蛰存的〈魔道〉不再止於都市人生的「疏離感」，修正的論述推進到文體實驗，討論敘述者意識如何成爲一種其他作家所未有的「意識流」表達。也許將對施蛰存研究背景的領悟移諸魯迅研究更有意思，〈「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一文探討魯迅的《偽自由書》是否拓展了批評空間的問題，聚焦點在文體與表達方式。若可充分注意《申報》老闆史量才（1880-1934）被暗殺的「背景」，直面高壓之下無從談說新聞自由，揭示問題的方法應更具透視深度。

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史無法迴避一個「淺」字，海內外研究者無論是誰都躲不開兩個事實：其一是客觀材料的隨時更新，每有新發現輒引發今日知昨日之非的洞達；其二是研究主體對方法理論的選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每一種理論方法的解剖刀都有其刀鋒與刀背，刀鋒之犀利輕靈與刀背之鈍重並非單獨的存在。二十世紀裏具有超卓的哲學涵養的理論家並不太多，文學研究的批評活動遊弋於散在孤立的理論島礁之間，其與現代文學學術史時段與諸多交合（或可借用李歐梵所謂「偶合」），海內外學者往往都不能盡免這個「淺」。李歐梵在二〇一九年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其〈漫談晚清和五四時期的「西學」和國際視野〉的主題演講表達對此的認識：「我們一直在不停地檢討，不停地論述，不停地解構和重構，衆聲喧嘩，沒有定論。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傳統。」<sup>51</sup> 他設定的學術生產的語境是讓「淺」與「沒有定論」互訓，又好像是在說現代文學學者的研究衝動像輪番漫上海灘的潮湧，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及現狀都是驛動不居的過程，需要一個有情的主體的投入，方能「情生驛動」<sup>52</sup>。

### 三、跨晚清 / 五四的架構

李歐梵的世界主義人文方向的結構性思維，在《晚清到五四》體現爲跨晚清 / 五四的知識架構和在晚清、五四兩個時段中歷史節點的設置。王德威院士爲

<sup>51</sup> 該會議論文集結成冊，於二〇二〇年七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見王德威等主編：《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香港：三聯書店，2020年），頁2。

<sup>52</sup>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李院士曾於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合辦的「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講「見樹又見林：晚清小說翻譯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討」。

「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sup>53</sup>作序，對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的方向有精要評析，評述李歐梵云：

李歐梵的中英著作極多。英語世界中的四部專書各有開拓先河的意義。《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1973）描寫五四以後作家從郁達夫到蕭紅等的歌哭行止、革命戀愛，夾議夾敘，堪稱是歐美學生進入現代中國文學領域的重要指南。《鐵屋中的吶喊》將魯迅請下神壇，以三十年代的文化政治為背景，縱觀大師的所為與所不為，有史識，也有洞見，更多同情的理解。《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1999）同樣是膾炙人口的作品。全書介紹上海的殖民風情與前衛文藝，是當代「上海學」大盛的關鍵著作之一。《東西之間：我的香港》（*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2008）則處理另外一座他鍾愛的城市，對香港的過去和現在有深入淺出的描寫，深情自在其中。<sup>54</sup>

這四部英文著作的目標讀者當然是以英文母語或作為第二語言的關注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人，也是世界主義論旨的當然選擇。王德威沒有提及李歐梵同樣傑出的其他中文／華語著述，以英文／夷言突出其「世界主義」的人文方向，於中可見這兩位大家的惺惺相惜。設想我們可以讓二人換個位置，不論王德威對李歐梵現代文學研究的肯定與推崇，而是問王德威憑什麼讓李歐梵視為學術知音？《晚清到五四》的〈自序〉認同王德威處理文學史的「晚清」和「五四」兩個歷史節點，看得出李歐梵對這一命題的闡釋與王德威「所見略同」。

《晚清到五四》的全部論文的篇幅，三分之二討論晚清，餘下的都是廣義的五四<sup>55</sup>。他的晚清討論對象沒有滿足王德威的寬闊論域，而是集中於林紓的翻譯（此外有討論「科學小說」《夢遊二十一世紀》的論文），尤其突出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通俗小說的翻譯，其中詳瞻深透的是〈見林又見樹——晚清小說翻譯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討〉。這篇論文標題採用雙關修辭，頗似向王德威致意（王德威

<sup>53</sup> 王德威〈序言〉，見《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

<sup>54</sup> 同前註，序頁3。

<sup>55</sup> 中國大陸學者往往將「五四」限於一九二〇年代，李歐梵《晚清到五四》裏的五四研究則在大陸學者的「二十年代」之外延及「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大陸現代文學研究代表性的分期可參見錢理群等編述的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該書由錢理群等著，於一九八七年由上海藝文出版社出版）。

的著作標題、關鍵字或論述的命名頗多雙關，每令人拍案叫絕<sup>56</sup>)。筆者認為李歐梵所謂「林」和「樹」至少呈現了兩個闡釋面向：其一，既有關於維多利亞時期小說翻譯文化整體的綜合論述，對應比喻為一片「林」，又有林紓翻譯數量最多的哈葛德(Sir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個案，他的哈葛德翻譯成績在一片小說翻譯的叢林中是棵大「樹」；其二，晚清小說翻譯，除了林紓，周桂笙(1873-1936)、包天笑(1876-1973)與惲鐵樵(1878-1935)等都是一時名家，周桂笙概述英國當代小說名家的文章〈英國近三十年中最著名之小說家〉一文刊載於一九〇六年的第三號《月月小說》雜誌，這個材料與印度學者 Priya Josni 所論當地流行的英國小說構成對比，成為不太喜歡考據的李歐梵文章中的一個亮點，譯家雖然林立還是掩蓋不了木秀於林的「林琴南」，至於這個「樹」字則回歸到翻譯對象維多利亞小說的本體，延伸為這個時期的「小說家族」——文化家族般的小說譜系。李歐梵賦予樹的英文詞彙 tree 以雙層意涵的延伸，就小說家家族譜系(family tree)而言，晚清翻譯小說男性作家譜系迭更司(Dickens)、薩克雷(Thackeray)、哈代(Hardy)、司各德(Scott)、柯南道爾(Conan Doyle)等，聳動(言情)小說女作家譜系有 Marie Corelli(高蘭麗女史)、Mrs. Henry (Ellen) Wood、Mrs. (Mary Elizabeth) Braddon 等。女性作家又帶出來女性、家庭、婚姻生命之樹的譜系，這棵樹上的枝柯則分蘖出多樣的小說文類譜系和文學史留名的文本。它還指涉論文寫法的點面結合，在面上對文本、文類、小說家的夾敘夾議之後，重點討論「言情小說」。這個重點的確定與筆者發想命名的二〇一五年國際學術會議題目「情生驛動」吻合無間，顯示出學問家李歐梵富有一顆靈動「文心」的小說家另一面。

很大程度上，是晚清翻譯的維多利亞小說的通俗(popular)品格與中國說書人市井表演的世俗(secular)的結合，才成長為後起續航的大陸文學史家范伯群(1931-2017)命名為「鴛鴦蝴蝶——禮拜六派」的民國通俗小說。李歐梵文中有清晰表達，鴛鴦蝴蝶派「五虎將」之一周瘦鵑(1895-1968)完全就是和林紓在同一翻譯脈絡上。周瘦鵑、張恨水(1895-1967)的通俗小說在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研究中成為五四精英文學的對照物，其實若按王德威<sup>57</sup>、季進為李歐梵設置的著

<sup>56</sup> 如王德威在《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0年)序言所言：「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後毛鄧主義(Post-Mao-Dengism)竟可一拍即合。」(頁2)。

<sup>57</sup> 王德威曾為李歐梵編過《現代性的追求》一書，於二〇一〇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題目「現代性追求 / 想像」之邏輯，而不受「反帝反封建」的意識形態規制，周瘦鵑輩無論在知識脈絡上還是文類形式上都是另類的五四文化，那正是晚清到五四的綿延，而非文化革命的斷裂。李歐梵視晚清翻譯小說為文學史的重要節點，郁達夫等作為浪漫一代既引來歐洲英國、德國文學又擅長晚清以前的舊體文言詩歌，也是另一歷史節點，此外還有施蛰存等，依照李歐梵歷史學的理解方式，這些歷史節點無一不是王德威著述論述之外，而恰能印證晚清 / 五四架構命題的典型案列。且不論李歐梵是否認同王德威的歷史觀和理論出發點，就處理晚清五四的歷史架構而言，李歐梵的世界主義人文方向都是王德威命題的忠實同盟。

#### 四、知識、傳統的重新脈絡化

世界主義人文方向需要致力新舊知識、文化傳統在特定語境裏的脈絡化。對中國與世界的溝通和知識交流，有多樣的評估方法：狹隘不過於視西方的知識文化傳播為「文化侵略」，在本土立場上積極主動地選擇是魯迅的「拿來主義」態度，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sup>58</sup>在學理較衡中考察中國近現代知識主體長時段的「格致」歷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學衡派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也是走了一條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1865-1933) 所啓發的世界主義的路線。

本書談到一個歷史知識的節點《新文化辭書》<sup>59</sup>，德國漢學家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1941-2019) 曾研究過它，李歐梵的研究也在進行中。他在「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漫談晚清和五四時期的西學和國際視野〉中，再次談到這部介紹五四時代新知識和西學的《新文化辭書》。該辭書介紹了很多西方作家、藝術家、思想家、宗教家和科學家，哲學家有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1941)、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和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而德國哲學和科學的介紹份額超過胡適 (1891-1962) 介紹的英美實證主義。這個德國與英美的介紹的比較，顯示李歐梵刻意說明他的世界主義不是籠統的中西交流。他考察現代西方作家如何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細緻

<sup>58</sup>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sup>59</sup> 該書於一九二三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共計十一位編者，主編唐敬果另著有介紹西方近代思想變遷的《近代思想解剖》，可知編者心目中「新文化」等同「新知識」。

區分國別文化的差異，尤其是郁達夫所受在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之外的德國文學之深刻影響。此外，李歐梵也重點關心外國小說在晚清東亞翻譯介紹時中國和日本接受影響的擇取分殊。書中有一篇奇文〈從一本小說看世界——《夢遊二十一世紀》的意義〉，這是李歐梵和日本年輕學者橋本悟合作的論文，奇特之處在「各言爾志」的形式，李歐梵介紹晚清楊德森翻譯哈亭這部科學小說的讀者反應平平；橋本悟論述近藤真琴日譯本引發的政治、軍事效應。此文合著者對日本和中國的接受反應、理解詮釋各占一半篇幅，觀其分析則符合若契。與晚清小說翻譯不同，五四階段翻譯介紹的知識文化特徵為更重視思想史。李歐梵關注晚清知識節點《泰西新史攬要》<sup>60</sup>，該書呈現了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與洋場才子蔡爾康 (1852-1921) 關於歐西歷史的知識互動。倘若我們從此上溯到從英國倫敦會來到上海、香港的傳教士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等人與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編輯於香港發行的《遐邇貫珍》(*The Chinese Serial*) 雜誌、上海的墨海書館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出版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所編輯《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 雜誌，進行歐西知識的輸入（第一號就介紹了希臘文學與詩人荷馬）。該刊很快流傳於幕府末期的日本精英階層，均處處烙印著中國文人知識的轉型軌跡。若非從舉業中脫離出來的「海天三友」王韜 (1828-1897)、李善蘭 (1810-1882)、蔣敦復 (1808-1867) 與西人合作，《六合叢談》的出版可能無法想像。這些知識脈絡的連貫，正可歸入李歐梵確認的世界主義晚清 / 五四的人文歷程。

上文提到的松江，現在是上海所轄的一個區（明清地方史志裏卻是松江府、上海縣的等級秩序），它是作為節點反復貫穿在李歐梵著作與論文中的作家施蟄存的重要背景（現在的歷史名校松江二中有施蟄存塑像）。如果說老城廂是租界洋場的歷史背景，松江則是比上海縣更深一層的背景。在〈「怪誕」與「著魅」——重探施蟄存的小說世界〉這一章中，李歐梵省悟到須注意施蟄存這樣作家的背景，不能僅賴美國方式的理論分析。筆者特別要指出，其實「背景」裏也有理論，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談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不忘「福斯塔夫 (Falstaff) 式背景」，中國論文傳統裏的背景是「知人論世」，只是中國散在的理論元素沒有被有效理論化。松江天然是江南才子

<sup>60</sup> 原著名為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作者為麥肯齊 (Robert Mackenzie, 1823-1881)，中譯本由李提摩太與蔡爾康合譯。

的背景，而且人才輩出。少年施蛰存浸染過松江文化，所以有〈上元燈〉風格的作品，即如〈梅雨之夕〉的都市街景中偶遇所見之女人都帶江南風韻。施蛰存小說著力寫人物意識而淡筆寫外形，可那些女人的外形彷彿是松江才子改琦(1773-1828)《《紅樓夢》圖·詠》版畫的十二釵線條。張愛玲(1920-1995)推崇松江近代小說家韓邦慶(1856-1894)的《海上花列傳》，其「穿插藏閃」的形式美學變幻難測，或可與施蛰存的意識流相俾。若論科學知識的現代傳播，西人的《幾何原本》從晚明徐光啓(1562-1633)與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翻譯前六卷，到清咸豐年間(一八五〇年代)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合作完成後九卷，全本十五卷是松江舉人韓應陞(1813?-1860，韓邦慶的堂伯父)校讎並出資印刷。這個晚清松江，是現代也是傳統，施蛰存屬於松江—上海—世界，施蛰存小說的前衛(avant-garde)與松江背景也盡可以歸入書中這篇〈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來討論。

李歐梵書中兩篇文題有「弔詭」，都與「傳統」關聯。世界主義人文的理論難題在於不同文化、文學並不都是當代模樣，不像施蛰存編的《現代》(*Les Contemporains*，意為當代人、同代人)雜誌，它非但要討論同代人的問題，更強調每一種文學與文化都有它的過去，發達的文化與文學絕大多數有其自身的偉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傳統與現代在多個文化文學之間可能有極為複雜的交叉組合而難以理順，於是弔詭產生，其機制往往各別特殊。司各德(Walter Scott, 1771-1832)的英國歷史題材小說 *Ivanhoe* (林紓譯為《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的翻譯過程，其弔詭機制被李歐梵稱為「雙重文化的過濾」，司各德的小說在英語文學傳統中有從 romance 向 novel 發展的文類蛻變，譯為中文則有林紓古文，和司各德的文體並不一致，〈歷史演義小說的跨文化弔詭——林紓和司各德〉一文就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林紓所譯標題的修辭是史傳文類而非通俗演義，而，「撒克遜劫後」講述某一種族遇上大世變的歷史，「英雄略」的完整表達是「英雄記略」。說到文類，中國小說史上的「歷史演義」原是「講史」，說書人在書臺上講述歷史過程中要敷衍／敷衍「義理」是書會才人的共識，儒家文化的社會主導(說書人的祖師爺為子貢)著說書演出要敷衍「春秋大義」。林紓是不會丟開「古文」而認同「講史」的，正如他不肯承認「白話」可以為「文」。同理，林紓翻譯哈葛德的跨文化機制是「文化倫理」多於「文化政治」。而魯迅、郁達夫、老舍(1899-1966)兼擅的新舊文體在五四文化價值層面是衝突的，那些常常寫舊體詩的五四新文學家的心理與文化機制至今缺乏闡釋，他們的舊體詩是更私

人化的文體，正如新文化的重要人物維持舊式婚姻（如胡適、魯迅、郁達夫等人）的私生活。上述弔詭並不能構成對世界主義人文方向的阻礙，李歐梵這樣的人文主義者就是為挑戰悖論而生。

閱讀《晚清到五四》，其世界主義人文方向意猶未盡，多有討論空間，略述一二，是為致敬。